



【西北联大与中国高等教育发展】

余天休社会学思想探析

刘莹^{1 2}, 王莺莺²

(1. 南京大学 社会学院, 江苏 南京 210093; 2. 西北大学 哲学与社会学学院, 陕西 西安 710069)

摘要: 余天休是中国社会学学科初创时期的重要人物之一。1922年他组织创立了中国第一个全国性的社会学学术团体——“中国社会学会”, 创办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份社会学学术研究刊物——《社会学杂志》, 发表了大量社会学方面的文章, 提出“移民殖边, 复兴西北”等社会学思想。余天休心系民族复兴, 以实现中国近代化为抱负, 为中国早期社会学学科建设做出了重要贡献。

关键词: 余天休; 社会学思想; 移民殖边; 复兴西北

中图分类号: C91-0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2731(2012)05-0017-06

余天休(1896—1969), 别号天麻, 广东台山人。早年旅居美国, 先后获得法律学士、教育学学士、政治学学士、经济学硕士和社会学博士学位, 被认为是“当时我国留学生得博士学位之最年轻者”^[1]。1920年回国后, 他先后在北京大学、北平师范大学、西安中山大学(现西北大学)等校任教, 讲授社会学相关课程, 是中国社会学初创时期的活跃人物, 不仅为我国早期社会学教育事业做出了重要贡献, 而且还积极推动中国社会学学科制度方面的建设。余天休知识渊博, 治学勤奋, 在其一生的学术生涯中, 著述近二百种, 其中著作三十余部, 数百万字^[2], 内容涉及社会学、经济学、政治学等领域, 但目前学界对其研究者甚少。本文拟从社会学角度探析余天休的社会学思想, 使我们重新思考和认识其在中国社会学发展史上的地位。

一、余天休对中国社会学的贡献

(一) 主张学术救国, 强调中国社会学家目的与责任

19世纪末20世纪初, 中国遭遇“几千年来未有之变局”, 救亡图存和实现民族复兴的思想成为时代主旋律。社会学作为“西学”的一部分传入中国。

余天休正是怀抱学术救国、心系民族复兴的理想回到祖国。1920年夏, 余天休应校长蔡元培之邀到北京大学任教, 讲授“社会学原理”和“社会思想之派系”等课程, 是我国最早讲授社会学课程的社会学家之一。

余天休认为“社会学乃近数十年来泰西新兴科学之一, 其中原理含集社会科学之精华, 实可称为诸社会科学之基础”^[3], 他为社会学下的定义是“社会学乃论人类团结之起源、演化、构造、作用及期间所发生之一切问题之科学。”主张用科学的方法研究人类社会, 这样才可以避免各种偏见, 因为“将来世界各国立国方针, 非由社会学立论而莫由。……明日之参政者, 非研究此科学将无以应付其治理之环境。研究社会学之重要, 可想而知矣。”^[4]主张“实习的社会学”, 他认为“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最大的区别, 常在研究方法的不同”^[5], 提倡社会学的精细研究, 强调“群治”中社会学家的责任。中国社会学家的目的是“必须具有了解中国人民之识力”, 因为, 中国是一个大国, 地域远比欧洲辽阔, 并且风俗、宗教、语言亦与欧洲不同, “假使中国人民不能自知本国人民之特性所在, 而外国人士亦必不能深悉我中国人民之实情。故欲研究中国社会, 必须具

收稿日期: 2012-01-11; 修回日期: 2012-06-11

基金项目: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规划基金项目(10YJA840024); 陕西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11H003)

作者简介: 刘莹, 女, 河北涿州人, 西北大学副教授, 南京大学博士生, 从事社会学理论与方法研究。

有真正科学的精神,协力研究而后可。”可见,尽管余天休接受了美国社会学的系统学术训练,但他绝不盲从。他真正关心的是中国社会,是如何借鉴在西方所学的知识与方法,改变中国积贫积弱的社会现实,并为祖国的富强寻找出路。所以,他不主张“吞取外来之主义”,而应当产出一种“中国主义(chinaism)”。而这种主义,又必须以改造中国社会为目的,故中国社会学家的责任,“就是推翻外国之传道与各种‘主义’,以科学的研究方法,建设一种新中国主义而后可”^[6]。进而,余天休从“国难与学术”关系的角度提出“学术救国”的主张,“我们提倡学术救国也就是主张养成这种应变的人材,使之将来应付我们的一切问题。如果我们能够成功的话,那么,我们国家内部的变化,或是外来的伤害,都能有法消灭或抵御了”。他认为“社会科学家今后的责任,应少提倡主义,而多注意事实,凡一切立论务须以事实为根据。社会科学今后研究的范围,不在乎广,而务求精密,应以个案为单位,令我们对于社会有精确的智识”,“今后的当道者,应特别提倡社会科学,并奖励社会科学家,务使社会科学与物质科学并驾齐驱,而为人类社会生活的指导者”^[7],表明了余天休引进西方社会学以研究中国社会,服务于本土的良好的“中国化”初衷。

(二) 成立我国第一个社会学学术团体并创办专业刊物

社会学作为一门学科在中国得到系统的发展始于20世纪20年代。余天休“具有服务的精神与宣传的特长”^[8],他为当时的社会学运动进行了自己不懈的努力与尝试。1922年2月,余天休在北京发起成立“中国社会学会”,从而成为中国社会学专业团体的开创者,当时参加该学会的有李景汉、步济时(John S. Burgess, 1883—1949)、朱有渔、许仕廉等人^[9],这是当时中国社会学界第一个全国性学术团体,也是中国社会学家致力于组织专业性学会的第一次努力。

中国社会学会成立后,为进一步扩大影响,形成研究合力,余天休创办了中国第一份专业社会学期刊——《社会学杂志》,由商务印书馆出版。余天休自任主编,约请名流、学者撰文,不仅形成了系统的、颇具西方现代色彩的社会学思想体系,而且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社会学学科建设的高潮。这份学术刊物原为双月刊,前二卷内容丰富而充实,刊载了一些经验研究的论文,有开当时风气之先之势。例如,1924年6月,在《社会学杂志》第2卷第2—3号合

刊的《婚姻与家庭》号,曾刊登大型问卷调查报告《中国青年婚姻问题调查》^[10],该文分析了835位男青年对婚姻家庭的态度,在社会上引起极大反响。

社会学在中国的成长与发展道路艰辛与曲折。组建学术团体和编辑学术刊物等活动推动了中国社会学的学科建设,但由于当时各方面条件还不够成熟,中国社会学会的很多活动和计划并未能充分展开。刊物因稿件来源有限,勉强从1922年3月维持到1925年8月,共出版2卷计9册,其中合刊的有3次。1930年,余天休任西安中山大学校长期间,该刊又由西安中山大学出版了第3卷的2—12期,刊载文章的内容质量与篇幅都大为下降。余天休改任齐鲁大学校长后,刊物又随之移至齐鲁大学。至1932年,《社会学杂志》停刊,共出版5卷13册,载文近200篇。1933年3月,余天休又主办了英文《中国社会学报》(The Chinese Sociological Bulletin)月刊,摘录各报刊文章刊载,艰难维持两年之后停刊,但这都不能抹杀余天休对中国早期社会学发展的贡献。专业性学术团体的创立和专业刊物的出版,一方面,使社会学的传播有组织、有计划地进行;另一方面,学术团体内部进行的学术讨论、学术交流、创办的刊物有助于扩大和深化社会学传播,实际上也标志着社会学在中国的发展进入了规范化、专业化和纵深化发展阶段。

二、余天休关于社会问题的分析

研究社会问题是现代社会学的重要传统,也是余天休社会学思想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留美归国的社会学家,他传播社会学和从事社会学研究的一个重要指导思想,就是运用社会学的原理,寻求中国实际问题的解决办法。因此,余天休非常重视对社会问题的研究与分析。他认为“问题者,举凡一切事物不易于明了或应付,而待以解决者之谓也。社会问题者,社会上关于多数民众之一切困难事件而待以解决者之谓也。”^[11]社会问题产生的原因及其所引发的后果都是社会性的,其解决也需要社会通力合作才有可能。余天休关注的社会问题涵盖许多领域,“社会学之范围包含人类社会一切现象,由政治现象,而至盗匪问题、娼妓问题、贫穷问题等,莫不在其研究范围之内”^[12],本文仅就下列领域探析之。

(一) 青年自杀问题研究

余天休非常关注青年人的社会心理。1930年,他根据一个省立乡村师范学校101名学生入学所填

写志愿书的内容,描述统计了学生的家庭状况(按照父亲职业分为:农、商、政、法、教育及未详划分)

及对社会状况的满意人数(见表1)。结果显示,近八成的学生对当时中国社会现状感到不满意。

表1 对于社会状况的心理统计(单位:人)

父亲职业	农	商	政	法	教育	未详	总共
对社会状况满意人数	7		1			1	9
对社会状况不满意人数	67	4	1	1	2	4	79
意见未详人数	12	1					13
总 共	86	5	2	1	2	5	101

数据来源:余天休.青年人的社会心理[J]社会学杂志,1930,3(2-12)

表2显示了该校学生的年龄构成及其对社会现状满意与否的描述统计。此外,余天休还统计了学

生中已婚者与未婚者对婚姻状况的满意与否,以及家庭状况及年龄对婚姻满意状况的影响。

表2 对社会状况心理者之年龄统计(单位:人)

年龄(岁)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9	30	42	总共
对社会不满意者	1	3	7	8	18	13	16	5	1	1	1	2	1	1	1	79
对社会满意者		1		1	2		2	1			1	1				9
意见未详者		1	1	1	4	1	3	2								13
总 共	1	5	8	10	24	14	21	8	1	1	2	3	1	1	1	101

数据来源:余天休.青年人的社会心理[J]社会学杂志,1930,3(2-12)

他认为当时整个社会的状况就是一个“乱”字,“中国今日的社会,已经乱到极点了,二十年来,社会最初的不安定只限于政治,其后渐推而广之,就闹到学校里头、家庭里头、和社会一切的一切的里头了,到了现在,几乎全国没有那一个人或那一个地方不受这种乱事的影响,在这种倾扰状况之下,稍有智识的人们,莫不灰心,因为这种缘故,社会上的事情就越闹越凶了;处在这种环境底下的青年人,因心志没定,加上社会上种种刺激,就发愤而积极以慎事,或伤心而消极以自杀。”这个统计数据反映了社会上有一定文化的青年人对社会不满意的心理状态。

余天休认为青年人的自杀是一变态的社会现象,这种现象产生的主要原因是中国历来教育目的之错误^[13]。他认为,中国传统教育的目的是为造就士大夫阶级,青年人求学,一般以升官发财为目的。“学而优则仕,为官作宦”已成为中国知识分子的主要谋生方式。但人口的飞速增长,知识分子人数不断扩大,能容纳他们并给他们以报酬的经济和政治制度的能力却十分有限。这样,大量知识分子无法就业,其生存状况受到严重威胁,自杀现象随之增多。余天休认为,今后中国救亡图存的道路,不在于高谈主义、大喊口号,或广贴标语,而在于改变中国人消极的人生观。

(二) 娼妓问题研究

娼妓,是民国时期对以卖淫为生妇女的通称,有公娼与私娼的区别。在官府登记营业者为公娼,秘密卖淫者为私娼。民国期间,中央政府没有制定统一的专门禁娼法规,基本沿袭了清末抽取“妓捐”的娼妓管理制度。

娼妓现象一直是中国传统社会躯体内的痼疾与恶瘤,是一个不容回避的客观事实。余天休发现,世界各国都在不同时期存在娼妓现象,他详列了伦敦、柏林、巴黎、芝加哥、东京等地娼妓的统计资料,以及当时中国北平、上海的最新数据,如根据北平市社会局最新的调查资料,统计北平市当时共有公娼2929人。余天休认为,当时中国的娼妓问题是一个很重要的社会问题,但废除娼妓不现实,“以现在中国的情形而论,娼妓制度可限制,可改良,受苦的妓女可解放,但要完全废止这制度,恐怕不容易”,他常说,“中国是一个变态的社会,奔走天涯行踪无定过剩人口格外多,这些过剩人口是无家可归,而无约束的好汉。”余天休认为解决这一问题的最好办法,是定期为妓女检查身体;限制准入的最低年龄;解放妇女,政府应负担主要责任;应丰富文化娱乐事业,“多设文化机关,如书报室、图书馆、青年会等,和合理的公共娱乐场,如公园、游艺场、戏院等;并设置整洁的街道,使一般无聊的男子有相当的消遣处

所”^[14]。为提高妇女对国家及社会的服务能力,余天休主张普及妇女教育,提倡妇女职业教育。

(三) 贫穷及匪患问题研究

中国自古以农业立国,农村的兴衰直接影响中华民族的兴衰。20世纪初,我国农村灾祸频仍,农民生活十分贫困。据余天休估计,贫困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95%,贫困线定为每户年收入250元。“中国大概每百人中有九十五个是穷的,每天没有饭够食的,皆是由于生产不足的原故。此处所谓穷的标准是如何呢?比如一家五口人,一夫一妻,三个子女,每年至少需要二百五十元”,“全中国所有的财产,平均分配给所有的人,每人不到一百元,所以我们可以说中国人个个都是穷的,亦不为太过。……一国之中,大多数的人既是穷的,那么,社会何以能够安宁呢?”^[15]余天休认为中国社会的根本问题是贫穷问题,贫穷导致社会动荡。

民国以降,国家政局不稳,军阀连年混战不休,而大量贫困人口加剧了社会的衰败,破产民众铤而走险,“拉杆”为匪,土匪蜂起是民国时期一个重要的社会特征,匪患也成为当时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各种抗匪自保、抗捐税的底层社会组织蜂起,特别是北方的帮会组织,尤其是河南的“红枪会”,山东的“大刀会”等二十多个帮会组织,余天休估计人数超过200万。“红枪会和大刀会为中国北方现在的大问题。倘若任其所为,不施抑制,不几年内,他们就能代替军队了。……此种帮会若无法制止,将来必为华北的大患。今日之谋国者当思之矣。”^[16]这些帮会组织的特点是“迷信”,他们以“神灵”为护符,自认为刀枪不入。余天休分析其原因,认为中国是一个“术制”的国家,中国文化的要点包涵权谋、术数、世故及礼教。要解决中国的贫困及匪患等社会问题,余天休认为不能靠自然秩序来维持,从而提出“群治的需要”。

在《社会学大纲》中,余天休将西方社会学的概念 social control 翻译为“社会的求治”或“群治”,而孙本文是用“社会的控制”,在《社会学名词汉译表》中,翻译为“社会制裁”;吴泽霖是用“社会的约制”。最终,余天休将之翻译为“社会调治”,认为其在字意上和学理上都较为适宜,与今天的“社会治理”较为相似,但更为温和。既然社会秩序不能靠自然秩序维持,那么调治中国社会病态的失调现象,必须开具“适宜”的良方,使服用之者,能够药到病除。于是,他建议“彻底近代化中国”是唯一的良药。然使中国实现近代化需要六个步骤,一为心理建设,二为社会建设,

三为军事建设,四为政治建设,五为经济建设,六为国际建设。这六种建设的重心是对内完成民主宪政,对外实现万邦协和,最终使世界联邦得以建立。这是余天休社会学思想的最终归结点。

三、余天休首倡“西部大开发”

(一) 人口社会学思想

人口问题是社会学研究的重要课题之一。20世纪初期的中国知识界为了探求中国“积弱”的病因和救国良策,对人口问题极为关注。清代乾嘉以后人口的迅速增长以及近代以来中国社会持续不断的动荡,致使“限制人口发展”的观点在当时得到不少人的赞同。有学者认为“世界上之可耕面积有限,而人口增加无已,再过一二百年后吾人将无立足之余地。”^[17]甚至有人把当时中国社会的一切问题均归结为“人口过剩”。

余天休不同意这种观点,他尝试用马尔萨斯人口论思想作为理论指导表现中国人口规律。他认为“人口生殖之速率,远过于物产增加之速率,故经若干年,物不加多,而人口日增,必不足以图存”^[18]。人类数千年来的历史可谓一部“血史”,“欧洲近一千年间竟有五百年以上有战事之发生”,中国“四五千年之历史,一治一乱之局面”,“其为人口过剩之产物,人为淘汰之结果,则孰敢致疑”,“平均每三十年一小乱,百年一大乱,二百年一朝代之更始”,“人口无有过剩之可能”。他赞同马尔萨斯的观点,认为限制人口的方法有两种:一是自然限制,如战争、水旱灾、贫穷、饥谨、瘟疫等可增加人口的死亡率;二是人为限制,如独身、晚婚者,可以减少人口的生殖率。因此,余天休批评当时的“人口过剩恐慌”是一种神经过敏^[19],并且认为人口问题十分复杂,“应结社以研究之”,“根本救治之方,厥在于人口之适当分配”^[20]。他试图从人口问题入手,解决当时中国的社会问题,从而提出“移民殖边”思想。

(二) “移民殖边”西北的思想

余天休将人口问题与“移民殖边”结合起来加以研究。他认为,中国地域广阔,且区域发展极不平衡,东部人口稠密而西部地广人稀。因此,欲解决中国的人口问题必须移民实边,复兴西北,一则可以巩固边防,二则可以厚利民生,故他提出“殖边运动”。1922年,他创立殖边协会,出版《殖边》月刊,并创办边语学校,邀请蒙、藏语言专家教授蒙古语、藏语及其他边疆语言,培养西部边疆建设人才,组织相关人士到西北地区进行考察活动,进行开发西北的准备,

时任西北边防督办兼陆军检阅使冯玉祥任该校董事长。后因感觉中国万事待举,需要培养各种人才,余天休遂将边语学校改名为北平私立东方大学,自任校长。1923年9月16日,他在《晨报副刊》发表杂感——《请国人注意这个边语学校》,并在各地发表演讲,积极倡导“移民殖边”,成为我国“倡导开发西北之先辈”。

余天休认为中国是个农业国家,移民殖边是解决当时民生问题的关键。因为中国人的生殖力甚强,如果社会安定,则人口每三十至五十年即有倍数之增加,造成粮食短缺,风调雨顺之年,尚可勉强维持;一旦雨水失调,或遇蝗虫等灾患,则粮食更感缺乏。于是,农村壮丁蜂拥而起,导致社会的动荡。在论及殖边的意义时,余天休说“吾人之所谓殖,即垦殖,或开辟之谓,边者,即边境之地,或空荒之地也。”^[21]他认为,欧美民族向外发展,有政府为后盾,以武力作保护,而“我们中华民族往外发展,是无意志的,是受政府压迫的,是必不得已而无武力保护的。大概中国历代的移民是因为人口过剩,居民无以为生,所以不能不挺而走险,过江湖上的生活。江湖生活是很苦的,因此不能三五成群,合伙结帮,互相维护”。所以,“立国于二十世纪之间,非有充分的武力来保护他应得的权利,是无立足的余地。”^[22]他满怀激情地倡议“我希望热血的同胞,放大眼光到边疆去,用无畏的精神,努力的建设,为我们老弱的中国作最后的挣扎!”^[23]。

(三) 教育社会学思想

余天休提倡全民教育,非常关心民众教育的普及问题。他“常跑到乡间去观察民众的生活”,认为当时社会之民权不发达、民主政治未实行、民智未开及民生未厚的根本原因在于“民众教育之未得普及”。中国的民众不读书不识字,谋政者就可以假造民意,扰乱民心,以达其私图。中国民众的人数,占全社会人数的百分之九十九,而民众之中不识字的人数,又占百分之九十以上。在这种情况下,“政治何以昌明,革命何以成功?今欲图谋补救之方,惟有倡导全民教育,使全民识字。”^[24]因此,他提出全民教育的宗旨在于“使全民识字以养成民主势力”。具体的措施为编写全民三百字课本,开展全民识字运动,“务使全市全省或全国人民无有不识字者”,在若干年内根绝文盲。

全民三百字课本分通俗、农、工、商、兵、儿童、妇女、及公民常识等八种,有初级、中级和高级三个级别。全国所有大小机关、学校、公署、警区、卡所等,

每处应一律附设一所全民学校,由党部、政府、民政厅或省政府通令办理之。所有全民学校,除特别规定外,农、工、商等各界协会组织,每界每日应授课一小时。学生以一月为毕业期限,凡毕业者均授予证书。全民学校分为三级,初级采用通俗三百字课本授课,一个月即可毕业;由初级毕业后可升入中级,其所用之课本具有职业性质,分为农、工、商、兵、妇女、儿童等六种班级,一个月毕业后再可升入高级阶段,课本亦为三百字,强调民众政治常识等内容,也是一个月毕业。初级教育务须强迫,中级及高级可略为通融。

余天休回国之初即提出“开发西北,关注教育”,而且身体力行。1929年,他应当时陕西省政府主席宋哲元的邀请,赴陕西任西安中山大学校长,其《社会学大纲》就是在西安写成并作为社会学课程的讲义油印发行,“今春余出西安中大,于公余之暇,将社会学之要旨编成大纲,以便一般学子之参考”^[25],对西北地区的社会学学科建设做出了一定贡献。在任校长期间,余天休努力实践他回国之初提出的“开发西北,关注教育”的主张。当时陕西发生了严重旱灾,许多学生因家庭生活困难而要求休学。为了帮助这些学生完成学业,余天休提出学生贷款八条办法,请求省政府给学生发放贷款,并获得批准。陕西省政府通令各县执行,使那些经济拮据的学生得以继续接受教育。

20世纪50年代,余天休返美国定居后,依然关心祖国的发展。为推动中美两国人民的相互了解和沟通,他于1951年在旧金山创办“中美学院”,为传播中国文化、促进中美友好做出了自己的贡献。1969年,余天休因胃病逝于美国旧金山。

毋庸置疑,余天休是中国社会学初创时期的一位重要学者,由于各种原因,其抗战之后的活动无处可寻,今人诉诸笔端的也不多见。但是其“移民殖边”、“社会建设”等思想对于我们今天正在进行的西部大开发、社会建设等社会事业仍能带来很多启示。同时,深入总结、探析余天休的社会学思想也是后学者应尽的责任和使命。

参考文献:

- [1] 汪公亮,朱照箕,陈文震.余天休先生之学术思想与政治理论,引自“民族复兴与世界联邦——余天休社会科学论集”[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333.
- [2] 汪公亮,朱照箕,陈文震.余天休先生之学术思想与政治理论·附先生著述目录一览,引自“民族复兴与世界联

- 邦——余天休社会科学论集”[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8:338.
- [3] 余天休.社会学大纲·自序,引自“民族复兴与世界联邦——余天休社会科学论集”[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8:3.
- [4] 余天休.社会学大纲,引自“民族复兴与世界联邦——余天休社会科学论集”[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8:19.
- [5] 余天休.实习的社会学[J].社会学杂志,1930,3(2-12).
- [6] 余天休.中国社会学家之目的与责任[J].社会学杂志,1922,1(1).
- [7] 余天休.学术救国[J].国立劳动大学劳动周刊,1932,1(19).
- [8] 杨堃.社会学大纲[M].国立北京大学法学院讲义(油印本),1941:249.
- [9] 中国社会学会本年职员表[J].社会学杂志,1925,2(5-6).
- [10] 甘南引.中国青年婚姻问题调查[J].社会学杂志,1924,2(2-3).
- [11] 余天休.中国现代社会的根本问题[J].社会学杂志,1930,3(2-12).
- [12] 余天休.社会学大纲,引自“民族复兴与世界联邦——余天休社会科学论集”[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19.
- [13] 余天休.青年人的自杀[J].社会学杂志,1930,3(2-12).
- [14] 余天休.娼妓问题研究[J].社会学杂志,1930,3(2-12).
- [15] 余天休.殖边救国[J].社会学杂志,1923,1(5).
- [16] 余天休.华北的隐患[J].社会学杂志,1930,3(2-12).
- [17] 余天休.人口过剩恐慌的神经过敏[J].社会学杂志,1930,3(2-12).
- [18] 余天休、余文铄.中国人口问题解决之必要[J].人口问题资料,北京:商务印书馆,1960:44.
- [19] 余天休.人口过剩恐慌的神经过敏[J].社会学杂志,1930,3(2-12).
- [20] 余天休.中国人口问题解决之必要[J].社会学杂志,1923,1(5).
- [21] 余天休.殖边问题[J].社会学杂志,1925,2(4).
- [22] 余天休.中国民族移殖的趋势和他的得失[J].殖边(月刊),1932,1(1).
- [23] 余天休.殖边月刊创刊词[J].殖边(月刊),1932,1(1).
- [24] 余天休.全民教育[J].社会学杂志,1931,4(3-5).
- [25] 余天休.社会学大纲自序,该序写于1929年7月14日,引自“民族复兴与世界联邦——余天休社会科学论集”[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8:3.

[责任编辑 卫玲]

On Yu Tinn Hugh's Thought of Sociology

LIU Ying^{1,2}, WANG Ying-ying²

(1. School of Social and Behavioral Sciences, Nanjing University, Nanjing 210093, China; 2. School of Philosophy and Sociology, Northwest University, Xi'an 710127, China)

Abstract: Yu Tinn Hugh is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persons during the preliminary period of sociology in China. In 1922 he organized the first national sociological academic community: *The Chinese Sociological Society*. As the founder of Chinese sociology academic research journals – *The Chinese Journal of Sociology*, he published a large number of academic articles in sociology area and also pointed out "Immigrants Borderland, the Revival of Chinese Northwest Area" and some other original thoughts. In order to push Chinese society into modern stage and arouse others' spirit, he made important and unique contributions to the sociology of early systems and academic construction.

Key words: Yu Tinn Hugh; the thought of sociology; immigration borderland; revival of the northwest